

# 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研究

任 翔

**摘要：**形式与实质相统一是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语文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可使学生感知语汇、语体、语境，从而提高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语文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可使学生增长知识、陶冶心灵、涵养情趣，从而提高审美趣味和人格修养。黎锦熙将语文教育的基本要旨首先落实在语文教材编写中，从编写标准、教材种类到编排体例每个环节都得以体现，形成统筹衔接的语文教材体系。他将基本要旨落实在语文教学上，提出“两纲四目”的教学方法，试图通过讲读教学，带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提升，并深入探讨了“读法”“作法”和“话法”之间的内在关联。黎锦熙的语文教育思想历久弥新，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形式与实质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5)06-0036-10

黎锦熙（1890—1978）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推动语文现代化和语文教育现代化，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开创者、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奠基者。黎锦熙留下的丰硕的语言学成果已为世人熟知，但他在语文教育领域长期深耕留下的重要思想，学界的研究还不够。重新认识和挖掘黎锦熙的语文教育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现实意义。

## 一、语文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黎锦熙，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自幼师承家学，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1905年考中秀才。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从此开启长达70余年的教育和研究生涯。

青年时代的黎锦熙，深受新学思想影响，始终走在时代前沿，参与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译介欧美新书，编写中小学教科书。1915年被聘为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员。他与当时的文化先驱者一起，积极倡导并组织国语运动，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口号。“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在黎锦熙等人的积极推动下，1916年在北京成立了“国语研究会”，蔡元培担任首任会长，黎锦熙、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为委员，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供教育界采用为宗旨。为更好地推进国语运动，黎锦熙向教育部提交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2 年度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2&ZD309）。

**作者简介：**任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计划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编订国音字典、开展全国方言调查、审查白话教科书、设立国语讲习所等。同时，向教育部提议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公布注音字母。<sup>①</sup> 他还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我国首届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时任校长陈宝泉表示，“教育重要的方面，第一在培植国民性，国民性的要素第一要有统一的语言”<sup>②</sup>，并就声音标准、科学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提出建议。在黎锦熙等人的强烈呼吁下，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国语运动从此出现了全新的局面。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同年正式颁布国音字典。

“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标志着语文教育从此迈上了现代化征程。黎锦熙指出：“自从两千年前秦始皇用‘书同文字’为统一大国的一种政策以来，后世帝王袭其遗策，又用严格的科举制度来保存并推行那‘文章尔是，训词深厚，小吏浅闻，弗能究宣’的古体文，及至于最不通而又最难作的‘八股试帖’，于是中国就只有繁难的文字教育，而对于语言便绝对地放任，绝对地听其自然，故中国向来就不知有所谓语言教育。”<sup>③</sup>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推进“国语”的主要原因。

1920年，黎锦熙应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任教，并在北京开办国语讲习所，把多年调研记下的《国文文法系统表》作为“国语文法”课的教材。他首次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设这门课程，运用大量例子证明白话文是有法可循的。这些法则规范严密，有力回击了“国粹派”制造的所谓新文学有文无法的舆论。为促进国语建设，黎锦熙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以国语讲习所为阵地，收集各种白话教学案例，同时培训师资队伍。教学之余，他经常带学生到全国各地考察，宣传、推广国语文法及注音字母。在考察过程中，他系统采集了各类白话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并对各地方言展开深入研究，从中找寻规律和通用法则。在黎锦熙等学者日复一日的探索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国语文法终为人们理解、熟悉和接受。

1924年，黎锦熙整理多年讲学、调查的资料，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这部以“国语”命名的语法书，在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汉语自身特质的深入发掘，首次揭示了我国白话文的内在语言规律，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白话文语法的专门著作。黎锦熙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句本位的语法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句法为纲，词类为目，并采用图解法来分析句子，使词的主从关系明确，职能和功用一目了然。该书自出版之日起至1959年，累计印行二十余版，充分彰显了该书的广泛影响力。

若将《新著国语文法》视为现代语言学领域的标志性著作，那么同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则堪称语文教育学的奠基之作。作为黎锦熙早期语文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该书在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序言里阐述了该书的写作背景：“民七（1918）在武昌、民八（1919）在山西视察讲演的结果，出了一本《国语学讲义》；民九（1920）在江浙一带调查讲演，同游的朋友又替我结集了一部《国语讲坛》。民十（1921）至今，整整地过了三个年头，我的光阴和精力，仍旧是全部供献作宣传国语的牺牲——这牺牲乃是自己心甘情愿的。”<sup>④</sup> 从中可知，《新著国语教学法》是在《国语学讲义》和《国语讲坛》的基础上，又经过整整三年时间才完成的。该书采用教科书的体裁编纂而成，共七章，内容涉及语文教学目的、读法、话法、缀法（作文法）、书法，以及国音字母教学法、国语教材和教法的新潮——设计法。该书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较为完整体系的语文教学法论著，既继承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优秀经验，又借鉴了国外语言学、

① 黎锦熙. 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 [J]. 教育公报, 1918 (3): 216-220.

② 任翔. 北师大学者论语文教育：上卷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21.

③④ 黎锦熙. 新著国语教学法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 229-230, 1.

教育学、心理学的优秀成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

黎锦熙一生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语文现代化和语文教育现代化。他的研究领域宽广，除了语言学，在教育学、文学、哲学、佛学乃至目录学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他留下近700种论著，其中著作100余部，论文500余篇。这些丰硕的成果都是在特定背景和特殊环境里完成的，无论客观条件如何艰苦，工作任务如何繁重，他始终坚守学术理想，未曾松懈社会责任，在“读法”“话法”“作法”“书法”等方面持续产出学术成果，为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打开了视野，为语文教育实践提供了经典案例。

## 二、语文教育的基本要旨

黎锦熙的语文教育思想博大而深厚，形式与实质相统一是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语文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可使学生感知语汇、语体、语境，从而提高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而语文教育“实质”（内容）的丰富性，可使学生丰富情感、陶冶心灵、涵养情趣，从而提高审美趣味和人格修养。形式与实质（内容）相互统一，缺一不可。他将形式与实质（内容）相统一的思想以图解方式进行展示，系统阐述了语文教育基本要旨的构成。

《新著国语教学法》第一章即为“国语教学之目的”，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语言文字有什么用”和“为什么要改国文为国语”这两大问题，并引用美国教育家杜威关于文字功能的阐述，旨在让人了解语言和文字的不同功用，明确国语统一的三大要素是国音（标准音）、标准语词和国语文法。<sup>①</sup>在此基础上，黎锦熙运用其擅长的图解法展示了“国语要旨”的框架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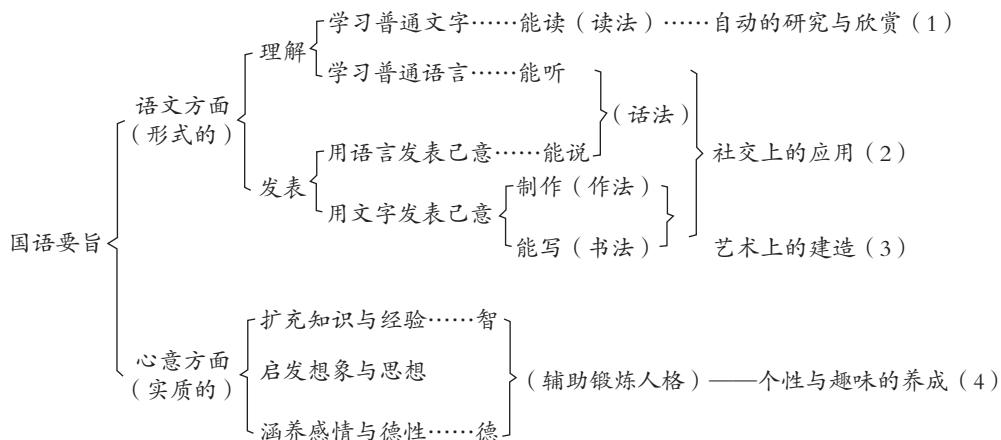


图1 “国语要旨”框架

由图1可知，国语要旨由语文方面（形式的）和心意方面（实质的）两大部分组成，具体包括五种能力和四种素养。

第一，两大部分。“语文方面（形式的）”分为“理解”和“发表”两大功能，“理解”重在学习“普通语言”和“普通文字”；“发表”强调语言和文字的实际运用。“心意方面（实质的）”包括“扩充知识与经验”“启发想象与思想”“涵养感情与德性”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主要目的是启“智”增“德”，以“辅助锻炼人格”，达到“个性与趣味的养成”。具体来说，“扩充知识与经验”是指学习者从外部获取知识并积累经验；“启发想象与思想”是指学习者通过自我提升培养想象力和思

<sup>①</sup> 任翔. 北师大学者论语文教育：上卷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12.

想力；“涵养感情与德性”是指学习者养成高尚之感情、陶冶道德之本性、实现人格之完善。这两大部分是互相依存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形式与实质并重。

第二，五种能力。五种能力指“语文方面（形式的）”的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五种能力。“能读”旨在通过“读法”教学，实现“自动的研究与欣赏”。“能听”和“能说”旨在通过“话法”教学，实现“社交上的应用”。这里的“能作”，主要指能写作文，“能写”不是指一般的写字，而是指向书法艺术，将书法学习提升到美育的高度，显示了书法学习的审美追求。“能作”和“能写”旨在通过“作法”和“书法”的教学，既达到“社交上的应用”，又实现“艺术上的建造”。

第三，四种素养。“国语要旨”框架图清晰地展示了“四种素养”的具体内容，“语文方面（形式的）”包括“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的建造”这三个方面，通过“五种能力”训练，培养学习者自主研究、语言运用和审美鉴赏的能力；“心意方面（实质的）”指通过三层面达成“智”“德”兼修，完善人格，实现“个性与趣味的养成”。框架图显示的四种素养分别指向阅读习惯、语言运用、审美鉴赏和人格独立。

黎锦熙不经意间将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做了科学概括。通过学习语言和文字，了解语文教育的形式，掌握读、听、说、作、写五种能力；通过理解语文教育的内容，启发想象与思想，增进智德发展，形成健全人格，达至人格独立，从而使学习者具备阅读习惯、语言运用、审美鉴赏、人格独立四种素养，最终实现学以成人。由此进一步表明，语文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只有这样，才能使“五种能力”和“四种素养”得到整体发展和提升。

“形式”和“实质”这两方面作为“国语要旨”的内核，在20世纪上半期得到学界普遍共识，但在两者侧重点方面曾引发争议。国文科以形式为主，实质为副，互相联络。徐特立在其出版的论著《小学各科教授法》里指出：“国语教授固有形式、实质二方面，然其主要目的则在形式方面。故教授时，当以形式方面为主，实质方面为副。”<sup>①</sup>孙本文也持此观点：“国文教授之作用，不外形式实质二端……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授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sup>②</sup>夏丐尊的观点更为明确：“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sup>③</sup>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文科应注重内容的学习，如穆济波强调，中学国文教学要以“人生教育”“国家教育”“民族教育”为主，“注意社会现象之观察”，“训练个人精神独立的思想与习惯”。<sup>④</sup>穆济波的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朱自清说：“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以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sup>⑤</sup>宋文瀚也说：“朱自清先生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里批评穆先生的主张说得好”“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别的学科在使学者明了，国文科则于明了而外，尚须使学者能运用。”<sup>⑥</sup>“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

由此也反映出黎锦熙“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语文教育思想之独特价值，这独特价值主要体现

① 徐特立. 徐特立文存：第1卷 [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160.

② 孙本文. 中学校之读文教授 [J]. 教育杂志，1919（7）：3-4.

③ 夏丐尊. 学习国文的着眼点 [J]. 中学生，1936（68）：25.

④ 穆济波. 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 [J]. 中等教育，1923（5）：1-14.

⑤ 朱自清. 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 [J]. 教育杂志，1923（7）：2.

⑥ 宋文瀚. 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 [J]. 中华教育界，1931（4）：189.

在三方面。首先，揭示了“语言”和“文字”的本质特征。黎锦熙指出，语言的功用主要是表情达意。他还进一步强调，语言产生于文字之前，文字是语言的升华，使语言“‘行远’而‘持久’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代表事物和思想的符号”。<sup>①</sup>这一观点，与朱光潜提出的“思想就是使用语言”<sup>②</sup>如出一辙，思想和语言是平行一致的，“人”与“语言”是一体的，人的思想与使用语言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sup>③</sup>。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这个工具，而是语言就是人的自身。从这个意义而言，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就是形式，教“形式”也就是教“内容”，形式与内容是互为统一的整体。其次，提出了语言和文字的四个方面作用是共通的。黎锦熙指出，语言和文字作为符号系统，二者仅存在功能运用层面的差异。基于此，他提出语言和文字的功能虽各有侧重，但口说、耳听、手写、眼看这四项功能可视为二者的共通属性。黎锦熙简明扼要地阐释了语言和文字的特征及其重要性，使我们更加明确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教授听、说、读、写。最后，明确了语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国语要旨框架图清晰地展示出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五种能力和四种素养的提出，从教会学习者精确地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情达意”，到“智”“德”兼修的人格养育，再到养成有“个性与趣味”的人，逐步完成了人的培养，使其成为人格完善之人。这一深刻的哲思与今天的“立德树人”教育宗旨完全契合。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语文课程是人文课程的特点，使学习者从语言和文字里获得心灵滋养、思想启迪、人格完善。这是“形式和实质相统一”的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的真谛，也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根本。

### 三、语文教育的教材编写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主要依据，是教育思想的重要载体。语文教育基本要旨首先要落实在语文教材编写中，体现在教材的编写标准、教材种类和编排方式中。黎锦熙“以学生为中心”的语文教材建设思路，全面体现了“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语文教育基本要旨，有力推进了语文教材的现代化。

第一，编写标准。黎锦熙认为，语文教材编写要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合于本国的教育宗旨；二是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生活需要的程序。<sup>④</sup>前一个标准涉及人才培养问题，强调教材编写要以教育宗旨为导向，以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为目标，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基点。此为教材编写的基本准则。后一个标准涉及教材，认为教材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和儿童心理的特点、年龄的特征，适应儿童接受的习惯；教材还要贴近儿童实际生活，与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相联系，教材内容既要有想象生活也要有现实生活，能引发儿童探索的兴趣，扩大知识面，培养责任意识。黎锦熙提出这两个选材标准，是基于对国家教育的深度思考，在他看来，教育没有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初等小学之国文一科，上之既无优美之趣，不足树文学之根柢；下之又违应用之旨，无救于国民之聋盲。”<sup>⑤</sup>他特别指出，旧式教材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无法拯救国民精神的缺失。鉴于此，他提出：“初小国文一科，其必整理之，改革之。视高小以上之国文，尤为当务之急……思纂成一种新式之国文以救其弊。”<sup>⑥</sup>故对教材类型、编排等提出相关意见。

① 任翔. 北师大学者论语文教育：上卷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12.

② 朱光潜. 思想就是使用语言 [J]. 哲学研究，1989（1）：27-33.

③ 朱光潜. 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 [J]. 民族文学，1943（1）：51-56.

④ 黎锦熙. 国语教科书的革新计划 [J]. 中华教育界，1921（2）：2.

⑤⑥ 黎锦熙. 黎锦熙语文教育论集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4，4.

第二，教材分类。鉴于当时全国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师资力量匮乏的现状，通过对国外母语教材的研究和实地调研，黎锦熙提出将小学语文教材分为“正读本”和“副读本”两种，便于各地合理使用教材。所谓“正读本”就是精读教材，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科书，主要用于教学，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他特别强调小学“正读本”教材以儿童文学为主体内容，涵盖儿歌、新诗、歌谣、曲词及旧诗等文类；寓言（又笑话、谜语）；童话（神话、无稽的故事等）；传说和传记；物语；小说；游记；戏曲等。<sup>①</sup>这些文学样式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学体裁。黎锦熙对每种文体的选取和教法，都做了详细的规范和说明。还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提出选择的要求。黎锦熙认为，教材的文学内容，“也要从实质上加一番分析工夫，作很适宜的支配”。并从健全人格和公民道德的知识人格教育等给出“实质方面”的分类。由此可见，黎锦熙不但重视儿童读物形式的多样性，还重视内容的丰富性，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语文教育思想在教材选文里得以全面体现。“副读本”就是略读教材，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读本，主要作用是弥补“正读本”的不足，学生可利用课外时间泛读，增加阅读量，培养阅读兴趣和能力，扩大知识面，满足心理的需求。除了文学、历史等材料，黎锦熙认为，各地的乡土资料、国内外及地方（含本市、本乡）的社会重大事件，以及报纸刊载或校内解读的新闻内容，均可编纂为小册或活页形式的“副读本”。<sup>②</sup>他还对“副读本”的使用提出建议：“副读本只须教儿童‘泛读’，不必和正读本一样的精读；因为泛读最能增进读书力，培养读书趣味。”<sup>③</sup>

第三，教材编排。黎锦熙认为，教材编排不但要统筹考虑各层次学校之间的衔接，还要考虑各学段之间的衔接，统筹衔接的教材编排思路是黎锦熙语文教材思想的又一大特色。他在充分考虑全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母语教材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教材的体例、分量、插图等提出改革思路。一是体例。黎锦熙主张“正读本”每学年编两册，“副读本”不限。为使各学段教材既相互衔接又易于被学生接受，他吸收了国内外读本体裁的分类方法，提出“正读本”的体例编排方式：一、二年级以“杂辑体”为主。把各种教材片段按照内容需要进行系统编排，各单元之间不必考虑内容的连贯性，这样可免使教材显得单调，又能确定教学的词类；三、四年级以“类联体”为主。教材内容虽是片段的，但排列灵活多样，有的按照季节分类，有的按材料类型分类，有的则是依据内容与主题专门分立，使所学知识逐步形成序列，以养成文体类别观念；高年级“类联体”与“连续体”兼用。“连续体”首尾呼应，具有文学上的结构，内容引人入胜，差不多是一部专书。若三个学段能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编排，符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心发展水平，那么就可避免教材形式的单一，也可打破语文的界限，使学生开阔视野，提高阅读兴趣。“副读本”的体例则相对灵活，既可以是小册子，也可以是大部书，抑或是随时编制的单张活页，重在增加阅读量，拓展知识面。二是分量。就教材分量而言，黎锦熙提出要充分考虑中国现实社会状况，找到一个适于儿童学习的分量，旨在使“正读本”在全国范围内具备合理性与普适性。并且，他建议要依据学生的发展水平和心理需求，以及地域之间的差异，多编写若干种“副读本”，供各地各校选择，不必作统一要求。他还指出，关于读本整体及各册的篇幅设置，要建立统一标准；各册内每课的篇幅则不用额外限定。如欧美及日本的同类读本，均未对每课字数及每册课数作出硬性规定。这些观点的提出既立足本国国情，又借鉴了国外有益的经验。三是插图。黎锦熙特别强调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插图与美育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其审美鉴赏能力。如德国、美国的读本都极为注重插

① 黎锦熙. 文学的国语教材之分类与支配 [J]. 中华教育界, 1921 (2): 1-6.

② 黎锦熙. 新著国语教学法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4: 48-50.

③ 黎锦熙. 国语教科书的革新计划 [J]. 中华教育界, 1921 (2): 7.

图的鲜明性与新颖性，以插图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我国的“正读本”在册数规定的情况下，不仅需要加入插图，其装订与印刷工艺也要追求精美。基于此，他对插图设计提出四项要求：其一，要简洁明晰，便于实施直观教学，以辅助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其二，要别致新颖，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其三，宜采用粗笔表现，既可供儿童临摹仿写，也可作为儿童作文的范本，进而推动读写能力的融合发展；其四，多用彩色插图，即便是日常随处可见的实物，最好也能在教材里配上彩图，以增加阅读情趣，涵育儿童的审美能力，凸显插图美育的功能。

此外，1933年，他与白涤洲等人一起编写出版了《复兴说话教本》，对编写教本的目的、内容及其教学方法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编写该书的目的是使儿童练习运用语言的能力。“说话教材”与“国语教材”的性质不一样，“国语教材”主要是教“文字”的读与写，“说话教材”重在教“语言”的听和说。黎锦熙将“说话教材”内容分为日常用语、看图讲述、有组织的演进语料、会话、故事、注音符号、演说、辩论八大方面。全书按照语词的难易、句式的复简、语言材料的变换进行有序编排，使儿童得到系统的、规范的“国语训练”。

黎锦熙的语文教材编写思想极具创造性，体现了其独特的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无论是教材编写标准、教材分类还是编排思路，他的心里始终有学生，一切从学生的身心发展、心理需求、生活实际出发，以学生成长成才为旨归，构建教材编写的整体框架，这是黎锦熙语文教材思想的立足点，也是闪光点。其次，呈现了统筹衔接的语文教材编写思路。从教材种类的“正读本”到“副读本”，从教材选文的形式到内容，从教材的体例、分量到插图，循序渐进地设计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由系统的方法渐进于应用的方法，由系统的教材渐进于应用的教材，为语文教材编写创造了科学适用的语文学习框架，形成了整体有序的语文教材体系。最后，开创了“说话教材”编写的新范式。为更好地培养儿童说纯正的“国语”，提升儿童的语言运用能力，黎锦熙身体力行地编写“说话教材”，从编写目的、内容到使用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故事内容以能陶冶德性，启发思想，增益智慧，培养兴趣者为主，将品德教育融入说话教材，为我国说话教材建设打开了思路，开掘了空间，树立了标杆。

#### 四、语文教育的方式方法

黎锦熙作为我国语文教材建设的重要开拓者，主持审查或编写的语文教材可以说不计其数，他认为教材不是终点，教材内容只有转化为教学内容，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20世纪上半期正值我国语文教学转型时期，教学质量下降，社会批评意见不断，尤其是白话文教学教什么、怎么教这些问题困扰着从旧式教育过来的教师。在此背景下，黎锦熙开始探索语文教学，撰写了系列教学改革案，将形式与实质（内容）相统一的国语要旨观渗透其中，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方法，尤其是“两纲四目”的教学原则，为语文教学开创了新范式。

##### （一）“两纲四目”讲读教学改革案

黎锦熙基于多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提出讲读教学要与口语能力培养建立关联，强调“读”不仅在于读懂文章，也要注重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读”和“说”二者密切关联，相辅相成。在此理念的支配下，他提出白话文和文言文教学要分别处理，形成了“两纲四目”的教学原则。

###### 纲甲 白话文与语言训练相联系

目（1）先须“耳治”（初讲时，学生不可看本文。）

目（2）注重“朗读”（须用美的说话式，并随时矫正字音、词调和语气。）

###### 纲乙 文言文视与外国语文同比例

目（3）必须“背诵”（预习时，即宜熟读；已读者，分期背默。）

目（4）彻底“翻译”（逐字接句，译成白话，确依文法，勿稍含糊。）<sup>①</sup>

“纲甲”，主要针对白话文教学，白话文因与口语具有高度关联性，其教学要紧密围绕语言学习展开，尤其应该在“听”“说”技能培养层面着力，可广泛采用朗读、对话训练、内容复述等教学方法；“纲乙”，主要针对文言文教学，文言文与口语有很大差异，文言文选目可等同于外文选目，采用教授外语的方法。这些规则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黎锦熙指出，“文字原是表示语言的符号，它的生命全在语言上”<sup>②</sup>，仅依靠“读法”教学本身的方法实施阅读教学，难以实现“读法”教学的彻底性，要遵循先“耳治”的原则。白话文虽与口语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且便于学生理解，但它是经过作者加工、美化与净化的书面语言，本质上与日常生活用语有别，故白话文教学要强化与语言训练的关联性，必须与“听”“说”连在一起。他还进一步指出：“白话文以‘耳’治始（初讲时，绝对不可看本文），以‘目’治终（练习考核时，只须‘对文朗读’），其成绩之表现则全在‘口’……文言文则始终以‘口’治为主（预习时即熟读，已读者必背诵），口治之极，自能影响‘目’与‘心’，若一霎时之‘眼到’与偶然间之‘心到’，而‘口’则长期不‘到’。如今学生之听讲文言文者，则其效果必等于零无疑也。”<sup>③</sup>

黎锦熙认为诵读是讲读教学的重要内容，并要求教师高度重视“诵读技术训练”，“诵读白话文，等于训练国语；国语训练就是白话文的诵读”。<sup>④</sup>为此，他提出白话文讲读教学“三部曲”。“第一，先把全篇内容从学生的耳朵里打进去，不让听者起首就看本文……第二，‘耳治’之后，还不能就用‘目治’。中间还要经过‘口治’，这就是朗读的训练。朗读时，要用美的说话式……第三，经过‘耳治’‘口治’之后，白话文的内容了解和文艺欣赏，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用‘目治’，深究本文。”<sup>⑤</sup>这可以视为“讲读教学改革案”的内在逻辑，也是对听、说、读、写教学一体化的学术表达，他还特别指出，文言文学习一定要“口”“眼”“心”“手”俱到<sup>⑥</sup>，特别是要熟读背诵，否则没有任何效果。

## （二）“三原则”作文教学改革案

黎锦熙极为重视作文教学，在他看来，读与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学习心理学视角来看，“从耳到口，从口到心，就是所谓‘声入心通’；然后文言一致，从心到手，就是所谓‘得心应手’了”<sup>⑦</sup>，这是他所说的“写作以外的诵读技术训练”。若忽视此类训练，仅认为通过增加写作量即可带动作文能力提升，在他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作文教学改革案三原则：一是写作重于讲读；二是改错先于求美；三是日札优于作文。<sup>⑧</sup>

黎锦熙认为“写作重于讲读”，写作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甚于阅读能力培养，其核心在于写作能力可包括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不能替代写作能力。他也认为：“作文仍以讲读为基础，讲读教学方法若不改革，习作必受其影响。”<sup>⑨</sup>因此，讲读教学与写作教学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还特别指出，仅就文章本身讲解文章，无法实现讲读教学之目的，若能在文章讲解时融入写作方法，则能实现讲读教学效能的最大化。“改错先于求美”这一条主要针对作文评改而言，黎锦熙认为教员的批改和指导，也须把握原则，文章首先要通畅，然后再说文章美不美的问题。对于中小学生

①③ 黎锦熙. 中等学校国文讲读教学改革案述要 [J]. 国文月刊, 1947 (51): 21, 24.

② 黎锦熙. 国语科“话法”教学的新案 [J]. 教育杂志, 1922 (4): 4-5.

④⑤⑦ 黎锦熙. 中小学国文国语诵读之重要 [N]. 北平时报 (中学生副刊), 1947-02-27 (4).

⑥ 任翔. 黎锦熙语文阅读教学思想探究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 68.

⑧⑨ 黎锦熙. 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 [J].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 1946 (2): 82-83, 83.

而言，他强调首先能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情达意，写出没有文法错误的文字，就算达到了目的，而不是指导学生进行“文艺创作”。第三条原则“日札优于作文”。黎锦熙指出：“日记札记，有内容，重资源，比之堂上限时作文，偏重语文形式之正确无误导者，当然益处更多，效用较大。”<sup>①</sup> 日札的题材和体裁灵活，不受限制，学生能写出自己的心情和感兴趣的东西。可以“有目的”地了解学生的思想，进行个别指导，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劳动，促使课内作文和课外日札融合，培养学生的写作习惯。

除了“讲读教学改革案”和“作文教学改革案”，黎锦熙早在1922年就发表了“话法教学的新案”。他特别指出“话法”比“读法”更重要：“话法本来比读法重要些，而且要用在读法教学之先，因为读法是教学‘阅看文字’，而话法是教学‘运用语言’……所以国语的读、写、作种种教学，乃至其他各科的教学，都是从‘说话’方面打进来的。所以说话教学实在是一切教学入手的基础，而一切教学又处处都有施行话法教学的机会。”<sup>③</sup> 黎锦熙重视的“话法”教学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现在“话法”教学即听说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多被忽略，是颇值得反思的。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黎锦熙的系列“教学改革案”，无疑能给当下语文教学带来新的启示。首先，区分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教学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文言文已逐步让位给白话文。但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如朱自清所言，“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sup>④</sup>。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生必须学习文言文。黎锦熙深知白话文和文言文不同的语言特点，所以特别强调要区分两者教学方式。他说：“选授文言文教材，则一定要熟读背诵，否则全是浪费。”<sup>⑤</sup> 其次，突出了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黎锦熙认为，诵读是把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的一种有意义的活动，有助于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诵读白话文，等于训练国语……国语训练就是白话文的诵读。”<sup>⑥</sup> 他认为，诵读不仅有助于写作，也可促进口语表达。良好的口语表达可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但是部分学生虽具备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却难以流畅书写白话文，其根源在于诵读太少，未能掌握将口语表达转化为书面语言的技巧。所以，他特别强调以读带写，以写促读，读写联动。最后，强调了听、说、读、写的一体化。自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已成为学界共识。“两纲四目”教学原则的核心思想，在于以“读”带动听、说、写能力的整体提升。黎锦熙还详细规划了白话文讲读教学的“耳治”“口治”“目治”三部曲，以及作文教学的“三原则”，这是其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创见。他的系列教学改革案，最终目的是促使听、说、读、写的有机融合，使这四项能力相互促进、共同提升。这是他对语文教学一体化思想的深刻认知，也是“国语要旨”思想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 五、结语

黎锦熙是我国语文教育领域的先行者。为顺应时代发展，他全身心投入语文现代化运动，在现代语文的荒原上披荆斩棘，以无畏的勇气与魄力开辟出辽阔的语文教育思想高地。他的见解，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皆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呈现了语文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蕴含着非凡的哲理和深刻的洞察力。在史无前例的国语运动中，他自觉扛起语文教育的大旗，

① 黎锦熙. 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 [J].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 1946 (2): 83.

③ 黎锦熙. 国语科“话法”教学的新案 [J]. 教育杂志, 1922 (4): 2.

④ 朱自清. 经典常谈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

⑤ 黎锦熙. 中等学校国文讲读教学改革案述要 [J]. 国文月刊, 1947 (51): 24.

⑥ 黎锦熙. 中小学国文国语诵读之重要 [N]. 北平时报 (中学生副刊), 1947-02-27 (4).

义无反顾地前行，为现代语文教育描绘了壮阔的前景，并将其付诸实践，从容稳健地构筑起语文教育大厦，成就了语文教育的大气候，撑起了现代语文教育的一片天空。本文探讨的仅仅是黎锦熙博大精深的语文教育思想之一隅，今天我们教授的语文课程，捧读的语文教材，运用的教学方法，使用的注音字母、简化文字、普通话、拼音、语法、修辞以及词典等，无不渗透着黎锦熙的心血和汗水。相信历史不会忘记曾经创造过历史的人，我们要永远铭记他，铭记为语文教育现代化做出了里程碑式贡献的黎锦熙先生。

(责任编辑 张一鸣)

### Study on Li Jinxi's Thought on Chinese Education

Ren Xiang

**Abstract:** The unity of form and essenc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Li Jinxi's thought on Chinese education. The diversity of the form of Chinese education enables students to perceive vocabulary, discourse style and context,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compreh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he richness of the con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llows students to expand knowledge, refine sensibility and cultivate intellectual interest, enhancing their aesthetic taste and moral character. Li implements this principle in Chinese textbook compilation, reflecting it in compilation standards, textbook categor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reating a cohesive and interconnected textbook system. He then applies this principle in Chinese teaching, propos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wo guidelines and four objectives”, aiming to advance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guided instruction, and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ay of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Li Jinxi's thought remains profoundly relevant today, still projecting significant insights and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Li Jinxi; thought on Chinese educ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teaching reform; form and essence